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有文字记录的人生都充满了波澜壮阔的事业，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让人倾慕的成功。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尘埃，雪地上的一个脚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随风而逝，不为人知。平铺直叙地记述一个平民青年的经历和远离都市繁华的旧时边陲风情，或许能给后人了解社会的变迁提供些许依据。这是很多老三届同学拿起笔来记录自己青春年华的初衷。

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过去五十年了。往事在脑海里时明时暗，似乎已经变成了“别家女孩儿”的故事。不写下来，就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而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画卷又感到心情沉重。青春经历的甜酸苦辣难以言尽。

每个亲历者在各种场合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都会有自己的感念和结论。为了尊重当事人的不同认知和避免无端的争论和尴尬，故事里的牧区插队队友都隐去了真实姓名。

京城风雨

1963年秋天，我以满分成绩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考上了我理想的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该校以其优异的教学质量享誉京城。姐姐比我早一年升入女附中，进入了五年制实验班。妈妈对我的升学特别高兴，请我们和大姨全家到长安大戏院看了越剧《晴雯》。

在小学时大家比较单纯，没有人更多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三年的全国大饥荒迫使大家低调求生存。从1962年起国家经济日趋好转，我们可以吃饱饭了，但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却在不断绷紧。在中学渐渐感到了以家庭的“阶级成分”来区分学生政治上的可靠度。学校高中毕业班的留苏同学明显都有很好的家庭政治背景。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显然受到限制。教数学的李光华老师学习成绩优秀，却因为家庭出身不能上大学，在学校的帮助下留校任教。班里的干部子弟到了十五岁就自然而然被吸收加入共青团，平民子弟则面临各种考验、审查和被拒。

在我们姊妹三人中，妈妈对我将来进军科研领域尤其寄予厚望，经常带我去参观高科技展览，扩展我的视野。我想，不管什么人当权，都要有人为国家搞科技，做实事，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好学习，随遇而安就是了。进入社会还是朦胧的将来，只管无忧无虑地享受我的豆蔻年华。

1966年我十五岁。5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西郊苗圃劳动锻炼，种植树木。劳动结束后回校，就要准备高中升学考试了，我自然希望能考出好成绩，升入本校高中。

一回到城市我就感到了紧张诡异的气氛，报纸电台里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言词中杀气腾腾。我们徘徊在批判斗争的边缘，升学考试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话题。

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被领袖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带给社会一个强烈的冲击，文化革命全面展开。人民日报、文汇报社论的调子越来越高，似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

头。“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口号充斥了大街小巷。揭发批判的强度和语言的犀利日渐升级。“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泼入了一缸浑水，泛起层层波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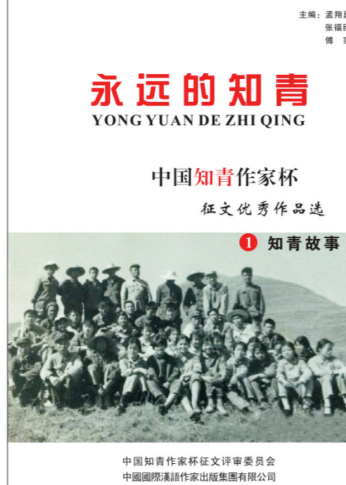
“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习成绩越好越是走白专道路”成为文革思潮。倍受推崇的女附中瞬间变为修正主义典型。学校里出身高干、高级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很多，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缠绵偶联，加深了学生中各种思潮碰撞的激烈程度。

运动开始后，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师大附中，邓小平派工作组到师大女附中做中学文革试点，要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研究指导中学运动。他们的在校子女直接担任了父辈和工作组之间的联络员。借用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学校里开始大抓反动学生，出身不好的同学备受歧视和压制。我们班好几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对社会主义不满”、“耍两面派”的帽子。班级团支部书记的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被冠以“仇恨干部子弟”的莫须有罪名而遭到残酷批斗，导致精神分裂。学生以家庭阶级成分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又以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以及对学校领导的态度而划分不同派别。

主席回北京后，以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学生运动为由撤离了中学的工作组。原校领导早已“靠边站”，学校领导层一时出现了真空。

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发布以后，北京市被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真等市领导被打倒了。8月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口号进一步在学校发酵，学校领导被认为是北京市委黑线人物，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为重点审查斗争的对象。

8月5日我和同学正在操场上看大字报，以高一三班军队大院子女为首的一帮人冲出学校南楼，发动了对校领导的游斗。校长、书记和教导主任都被扣上



纸糊的高帽子甚至厕所里的脏纸篓，排队在操场上游街。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斯文扫地，狼狈万分。我和同学们在从众心理的怂恿下从四面八方跑过去围观，跟着喊口号“打倒黑帮”、“打倒牛鬼蛇神”。看到平时受尊敬的校领导被批斗羞辱，心里迷茫。但又觉得干部子弟最紧跟领袖，不会有错。等到校领导们被赶到礼堂前，打翻在地遭到暴力围殴时，我才感到惶恐，赶快离开了现场。

我们每天都要集体背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想，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可能缺少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缺少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有更多的小资产阶级温情和恻隐之心，所以更需要思想改造。可我还是不理解平时倍受尊敬的校领导如何在一夜之间从革命干部变成了万恶不赦的反革命。在以后的文革风暴中，每日发生的事情都会不断地冲击、颠覆我先前的认知。

接近晚饭时分我和同学王小娃在校园里散步谈心。走到学校后院北便门附近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循声而去，看到一辆堆满厕所脏纸的架子车，看不到人影，只有微弱的呻吟声一阵阵从纸堆下传出。我们俩惊恐地对视着，说：“是不是卞仲耘，她是不是不行了？”环视周围空无一人，我们两个女孩子害怕，不敢翻看，慌忙跑往学校前面找人。

在学校礼堂前我们碰到高二的刘进学长，赶紧把情况告诉了她。刘进是党员，在学生中颇有威望，在工作组时期是文革筹备委员会成员。她马上找人一起把卞校长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可惜回天无术，女附中的书记、付校长卞仲耘成为中国第一个教育界的文化祭品。据说她被带离操场后经受了三四个小时带钉木棒的抽打，开水泼烫，以至大小便失禁，死时一身血污。对校领导野蛮出手置于死地的竟然是平时被着力培养呵护的红五类女学生，不能不说是当时教育制度的极大讽刺和人间悲剧。

出于对校长被暴打致死的恐惧和忧虑，8月6日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市委请愿，求见市委书记李雪峰，请求他派人到学校领导运动，结束乱象。老的北京市委被打倒了，新的市委在运动中步步观望。请愿的群众站满了市委门前的大街，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人人面色焦虑。请愿书送了进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中学批斗校领导和教师的劲头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升级，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

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早已风靡全国，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去天安门参加集会的。我从来认为人生来平等，并不因为家庭出身而感到自卑。我知道有很多同学的父母是革命干部，而他们的祖父母都不是红五类。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不堪一击。加之文革前在各种活动中多次见过中央领导人，所以泰然处之。

——待续——

(本文收录进“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系列丛书《永远的青春》。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版权归属作者。)